



传媒视域中的文学

建国后十七年
小说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

陈伟军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传媒视域中的文学

建国后十七年
小说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

陈伟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媒视域中的文学:建国后十七年小说的生产机制
与传播方式/陈伟军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 - 7 - 5633 - 8376 - 4

I. 传… II. 陈…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8707 号

责任编辑:石 坚

装帧设计:范昊如

总 监 制:郑纳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00mm 1/32

印张:7.75 字数:195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蒋述卓

伟军对学问的执著追求是令我感动的。2003年他还在南方日报社要闻部工作,但却愿放弃这一重要岗位,立志攻博,之后又决意从报社调入高校任教,这在一些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无论是从政治发展还是从经济效益去说,伟军的这一选择绝对是一大舍弃。然而,伟军又是懂得什么是“舍得”的,他的“舍”使他终有所“得”。正如他当年考博时的表白,他的最大心愿还是在学问,他的目标是矢志学术,在当好教师的同时做好学问。这在当今学术风气浮躁,不少人视学问为草芥如浮云的环境中,他的选择无疑是有点“另类”的。惟其如此,他在获取博士学位之后,又花了近两年时间去认真修改他的博士论文,今日付梓推出,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一大“得”。

此书的研究视角得益于他的传媒从业身份,他在报社工作了几年,硕士研究生时学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他的知识背景以及工作经验,使他很自然地选择了从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的角度去审视建国后十七年的小说生产。他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生产的体制、作家稿酬的变化、文学期刊运作的导向、出版社运作的计划化以及图书发行的方式等方面去探讨小说生产所受到的各种约束和所采取的生产途径与策略,从而在“生产”的层面上对“十七年”小说所受媒介力量的支配进行了较为清晰完整的揭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建国后十七年小说生产研究的空白,同时也避免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去研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尴尬,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十七年”小说的发展进程有诸多启发。

此书采用的是一种大文化考察法,重视的是社会文化语境的整体气

候,文化体制对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总体约束,因此,作者在研究中虽然采取的是“生产”研究视野,但又不把“十七年”小说的生产状况视为单纯的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与当今从市场角度去研究文艺的生产和消费是截然不同的,这也决定了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艰难度。但伟军不畏艰难,还是从多个侧面去接近它,并对其中的原因给予了充分的揭示与分析。比如对同人刊物和文学流派问题,就从“边缘”的角度去揭开了建国初期文学生产模式的某些独特之处,同时也为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刊物急骤萎缩趋于解体作了文化体制演化的一个解说。

伟军是一个学风严谨的青年学人,为了把论文写扎实,他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甚至还依据统计学的方法对一些事项作了详尽统计。为了说明问题,有的地方还采用了列表的方式,既显得简明,又能强化文章的说服力。因为此课题研究确有较大难度,有的问题要得到较圆满的阐释也较难达到,他只能是在存在着许多预定制约的情况下力图作出较有创新的个人见解。其实,我对他的研究能达到如此的成就是满意的。

伟军从事学术研究有远大志向,扎实而又勤奋,我对他能取得更大的收获与进步抱有厚望。

是为序。

2008 年岁末于暨南园

目 录

序/蒋述卓	1
-------	---

导言 传媒视域与文学史研究	1
---------------	---

第一章 小说生产的体制化社会语境	13
第一节 文学生产体制与媒介管理架构	13
第二节 稿酬制度流变与作家的生存方式	28
第二章 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	48
第一节 文艺批判运动中的媒体话语独白	48
第二节 新闻报道中的作家形象	65
第三节 作家心态张力与小说叙事形态	79
第三章 文学期刊运作与小说生产、传播	96
第一节 规范化力量制约下编辑的选择	96
第二节 边缘言说:同人刊物和文学流派	120
第四章 出版社运作与小说生产、传播	135
第一节 出版的计划化及传播的导控性	135
第二节 冯雪峰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151

第五章	复合力量中的小说传播	165
第一节	红色小说的畅销模式及其成因	165
第二节	通俗小说:被改造的“旧文艺”	183
第六章	读者大众的“视野”重塑	195
第一节	文本生产者、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	195
第二节	符码灌输与趣味转变	205
结语	小说格局重构中的媒介角色	222
参考文献		228
后记		241

导言 传媒视域与文学史研究

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对文学的文化观照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当中,不少学者立足大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进行多维阐释,相应地拓宽了学科的研究空间,也深化了对文学本身的理解。例如,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文学创作、理论批评与传播载体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是如何互动的,都成为了学界关注的课题。正如陈平原所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界日益关注晚清以降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相关论著陆续涌现,且有成为新一波‘显学’的潜在优势。”^①传媒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逐渐凸显,研究者在新的视域中对文学进行再阐释,形成新的话语策略和前沿理论。

由于以往的研究相对忽略了传媒变革对作家思维方式的影响、媒介生态对文学实践的作用力等,文学生产未被置放在特定的媒介环境和传播环境中去进行动态考察,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带有某种“片面性”,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与媒介系统、传播制度之间的扭结,没有被清晰、完整地揭示出来。因此,从传媒视域观照文学,探讨文学生产中的媒介力量,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艺术价值是如何被创造、传播、诠释和接受的。

^① 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3页。



文学与报刊等传媒结下紧密关系,是近代以来一个醒目的社会文化现象。杂志、报纸副刊和出版社,成为文学生产的重要载体。这一简单的事实说明,传媒直接介入了文学生产的过程,它们共同置身在文化场的有机结构中,形成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稳定关系。曹聚仁指出,“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①可以说,传媒在塑造中国作家群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对文学界和公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德福勒提出的媒介效果的“文化规范”理论,“媒介不仅直接地作用于个人,而且还影响文化、知识的贮存、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媒介提供了一系列概念、思想和评价,受众成员可以从中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②而20世纪中国文学正是由媒介系统、政治系统和其他系统等多种文化力量共同塑造的。由此,研究者从各自的话语立场出发,把握文学在特定时代的社会化过程,揭示文学建构意识形态背后的媒体手段。杨义、钱理群、郭延礼、吴小美、袁进、谢泳、杨扬等人,先后都介入了传媒和出版文化的研究。如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已出版《创造社与泰东书局》(刘纳著)、《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孙晶著)等。

媒介在文学生产与传播中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但它的具体影响,却不是“不言自明”的。出于对文学与传媒独特的研究价值的体认,不少知名学者指导其学生对现当代文学期刊进行研究,把《七月》、《晨报副刊》、《小说月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对象。受1980年代中期起陆续引进的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媒介研究、公共空间

①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8、83页。

②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等西方理论的影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术群体显示出了对报刊研究的浓厚兴趣,除了师长辈的成果外,青年学子的研究也令人关注。^①作为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不少高校的博士生论文也涉及了传媒与文学的交叉领域。如南京大学马永强的博士论文《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②,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探讨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及新文学的发生。论者把新闻传播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力图在学科的交叉地带发掘学术的新增长点。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尝试,虽然操作起来不容易,但它的创新空间大,可以拓展创造性思维的空间。

跨学科研究要取得进展,最重要的是研究者的学术思路必须更新,积极寻求思维方式的范式转换,使研究对象在不同的视域中获得重新认识的价值。从媒介的特点和运行规律来看,它在文学的发展中不仅仅体现为工具作用,创作主体的观念、文学思潮的形成以及接受者的美学趣味都会受到传媒的某种潜在制约。由历时态观之,传媒是20世纪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它不仅推动了文学生产、传播,影响着精神生态环境,而且催生文化市场的形成,改变着作家的生存方式、思维观念。陈平原在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专著中指出:“这无疑是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绝大部分的小说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的;而且,大部分主要小说家都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小说杂志。”^③由于报纸杂志以及出版业的日益繁荣,新小说的市场不断拓展,为小说家的专业化提供了关键条件,商品意识迅速介入小说家的创作过程,作家开始认真

① 据陈平原介绍,近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涉及传媒与文学的有:李宪瑜《〈新青年〉杂志研究》、方迎九《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消长——早期〈申报〉文人研究,1872—1905年》、颜浩《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与舆论氛围——以〈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中心》、孙晓忠《建国初期文学报刊体制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以〈文艺报〉为中心》、尹文娟《〈中国丛报〉研究》、李庚夏《1930年代上海文学期刊与现代派诗潮》。参见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载2002年1月9日《中华读书报》。

② 马永强:《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思考并重新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转变叙事模式。研究者认识到,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百年来摆脱落后耻辱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展开的,同时也在现代传播媒体的形成中诞生与成长。传播技术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通过分析各个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传播手段对文学生产、文学观念的影响,去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运及其变迁,从而思考传媒时代的生存处境和文化环境中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现实,叩问文学艺术生存与发展的诸种可能性等等,都是全新的课题。^①而文学研究原有的解释框架,很难全面阐述这些问题并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传媒与文学的深层联系,超出了我们固有学科知识的边界。

传媒之所以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源于其顺应时代要求所作的演进。晚清以来,报业出现了根本的转折。根据李欧梵的考察,“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的声音”,报纸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产生了巨大作用。李欧梵从对报纸副刊的研究入手,探讨近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②李欧梵的研究提示我们,报纸副刊不但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传统,而且与民主制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关联。王中忱的一些史料分析从另一个方面察觉到杂志传媒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1905年,科举制度终于废除,众多士大夫阶层的读书人从传统经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渴望新的文化信息,又积极地寻求加入到新政治、新社会的途径。自1900年开始,顺应这种需要的各种政论性报纸、杂志创刊,到1910年至少达到300种以上。”^③报刊事业蒸蒸日上,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相应缩短,媒质的种类、制作和传播方式的变化,

① 赵抗卫:《现代小说艺术的命运与大众文化和多种传播手段的挑战》,《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

②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10月号。

③ 王中忱:《媒体·民族国家论述·“新小说”观念的诞生》,《越界与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促使人们转换思维观念和价值标准。文学在这样的语境位移中,打开了广阔的话语空间。

无疑,在传媒视域的观照下,文学研究获得了新进展。以重要文学期刊的个案研究为例,它延伸了学科的边界,丰富了当代话语创新的知识谱系。在中国期刊史上,《新青年》、《小说月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都是显赫一时的杂志,对它们的认识,实际上牵涉到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①,通过重读《新青年》、重看文学研究会来重读文学史,考察这份杂志和这个社团是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它们对文学文本的产生和流传,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有些什么影响。王晓明的研究揭示出,五四新文学的独特的诞生方式,派生出这样三种观念:第一,文学的进程是可以设计、倡导和指引的;第二,文学是应该而且可以有一个主导倾向的;第三,文学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可以对创作发挥强大的指导和规范作用。这些观念对“五四”以后的文学进程有着深远影响。正是在视角的转换中,王晓明注意到了报刊在构筑文学机制、文学规范中的作用,传媒与文学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的运动是相互联系、呼应的。研究视域的变换,使得文学现象获得了新的理论阐释。

在文学期刊的运作过程中,编辑作为“把关人”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略的。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编辑的创造性处于被遮蔽状态,他们不过是作家的服务者,其独立性、自主性没有被充分认识。为了揭示期刊编辑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刘增人对“茅盾系列文学期刊”进行梳理,考察了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文学》、《文艺阵地》等系列文学期刊,透视其生态环境、发展规律,对文学编辑事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② 其实,除了茅盾外,像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周作人、胡适、胡风、林语堂等作家或理论家,也是杰出的编辑家,写作、编辑、出版在他们那里是

① 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

② 刘增人:《试论茅盾系列文学期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考察报告之一》,《文学评论》2004 年第 4 期。

“三位一体”的,他们主持的刊物,在新文学史上都发出了独异的声音,形成巨大的召唤力量。他们的编辑活动、编辑思想,直接影响着文学期刊运作,与创作群体的培育、文学思潮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关联。通过这些编辑家的卓绝努力,一批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学期刊相继出现,成为组织文学社团、形成文学流派的手段。

研究期刊,除了离不开史料的钩沉辑逸以及编辑思想的深入探讨,同时也需要考究刊物的运作机制与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在共和国文学史上,无论从哪方面看,创刊迄今的《人民文学》都堪称最为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吴俊通过对《人民文学》创刊和复刊过程的透视,阐明《人民文学》独特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是由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决定的。^① 而李钧聚焦 1958 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解析该刊编辑思想在时代语境中的变化,1950 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② 这些说明,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以及编辑思想、发表原则的调整,都有时代政治、文化的深刻投影。

与《人民文学》类似,《文艺报》也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国家级期刊。《文艺报》的重要性,仅从它的“编者按”便可以看出。程光炜指出,《文艺报》“编者按”一向是反映文艺新动向的极其敏感的风向标之一。1949 年—1976 年间当代文学史的“变化”、“调整”和“转折”,大多是以“编者按”为预兆和归宿的。在这个意义上,“编者按”实际参与筹划了中国当代文学草创期的格局和具体操作。^③ 孙晓忠从另一个角度注意到了《文艺报》的编者按与社论,他通过分析冯雪峰在《文艺报》的编辑活动与办刊理念,清理和总结了左翼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经验。^④ 因此,考察文学风尚的演变,离不开对文学期刊“编者”意图的细读。

① 吴俊:《〈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复刊》,《南方文坛》2004 年第 6 期。

② 李钧:《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 1958 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齐鲁学刊》2001 年第 2 期。

③ 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 5 期。

④ 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中心》,《文学评论》2005 年第 3 期。

除《文艺报》、《人民文学》外,《花城》、《当代》、《收获》、《十月》、《上海文学》、《山花》等当代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也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陈海锋对《花城》创办以来坚持先锋与多元的编辑方针的剖析^①,蔡兴水、郭恋东对《当代》“宏大叙事”的深入解读^②,揭示出了期刊中各具特色的文学、文化景观。

二

传媒与文学的相遇,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学术思路、丰富了研究对象,它还贯通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领域,提供了新的知识范型。在思维范式的转换中,研究者借鉴葛兰西、布尔迪厄、威廉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的理论,从开放性的话语立场切入文学、文化实践,力图对现有文学研究的某种局限性进行纠偏,提出新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评价尺度。

大众传媒是维系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重要角色,与社会关系、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它的这种固有属性,适合从文化研究的逻辑进行审视。媒介是如何介入文学生产、传播,进而建构社会文化生态、文化秩序的呢?孟繁华的《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③认为,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呼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和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或者说,现代传媒推动或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散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媒甚至成了某一时代的象征。比如“五四”与《新青年》,延安与《解放日报》,新中国与《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与“两报一刊”等等。因

① 陈海锋:《〈花城〉25年(1979—2004):先锋与多元的坚持》,《肇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蔡兴水、郭恋东:《宏大叙事的样本——阅读〈当代〉(1979—2000)》,《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③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此,传媒被称为“一种新型的权力”。这个权力不止是话语权力,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为民间社会所认同,它也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孟繁华从本土的研究对象、问题出发,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国化,通过传媒的变化分析阐释了中国文学、文化生产的变化,深入而细致地揭示了权力机制是如何在文学、文化的话语空间中运作的。

与孟繁华一样,一些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葛兰西的理论作为探究传媒与文学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何言宏的《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①一书,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埃里克森的“身份认同”为理论资源展开研究,试图揭开“伤痕”、“反思”小说思潮中的历史迷障。该书研究了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与话语规范是如何确立的,作者通过对《人民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等大量文献的阅读梳理,经过复杂的统计分析,从作协、作家身份、出版、评价等机构性组织方式等入手,考察了“文革”后文学与国家体制构建之间的深层联结。文学不是一个纯粹自足的领地,研究者以传媒为中介,立足史料梳理、文献分析、叙事解读,阐明了文学体制、文化主体的建构法则。

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是纵横交错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至少包括了创作、出版、发行、销售、购买及阅读这些彼此有着内在关联的环节,同时还受制于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文化风尚、文学制度与传媒运作机制。20世纪作为一个较长时段,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必然因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历史特点。例如,当代文学在1949年之后基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而出版社在进入“当代”之后,不是被取消、合并,就是改变了出版社的性质,原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文学杂志和出版,都纳入了国家体制之中。^②在体制化力量的作用下,文学和传媒的自主空间

^① 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②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第208页。

逐渐收缩。

文学与传媒在进入“新时期”之后,当然是另一番景象。传播介质的根本变化,影视、互联网等的迅猛发展,形成社会历史转型期的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给文学带来巨大冲击。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①,借用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有关“文学场”的理论,从文学期刊、出版、评奖、批评、作家等组成文学生产机制的几个环节入手,具体分析它们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当代文学的样貌、成规及未来走向产生的内在影响。陈霖的《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②,从“大众传播与作家身份”、“大众传播与文学批评”、“文学期刊与图书出版”、“新闻传播与文学”、“影视与文学”、“互联网与文学”等角度研究了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关系,揭示了大众传播以及大众文化对文学体制造成的冲击、震荡,以及在冲击、震荡之下文学体制自身的调适、裂变和异化。黄发有的《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③,也对文学期刊、出版、影视文化与小说的交融互渗进行了文化阐释。而欧阳友权等的《网络文学论纲》^④,是对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生态进行理论勘察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深入论析了网络文学的文化逻辑、存在样态、主体视界、创作嬗变和接受范式等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何为文学?文学何为?”研究者敏锐把握时代文化语境的变化,探讨文学发展、演变面临的冲击和机遇。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科技革命的浪潮强劲涌动,新媒介的出现,这些都成为新的文艺生产和传播机制的催生力量。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学的存在方式,作家、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读者的接受

①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④ 欧阳友权等:《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都大大偏离了传统的轨道,需要重新认识。

三

媒介在文学生产中的作用,当然不应被无限夸大。文学毕竟是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媒介的力量也不应被轻视,学界对它予以充分关注是有理由的。目前,在传媒与文学的研究热中,虽然不少成果涌现出来了,但仍然有一些领域亟待掘进。

首先,在传媒与文学的交叉地带中,研究的时空范围应该是广泛的、多方面的,研究的对象也可以多种多样,而不是局限于某个范围。典型的个案研究当然是必需的,但只有在整体性的大背景中,在横向拓展、纵向比较等维度上,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才会进一步凸显。以建国后文学报刊、出版社的情况而言,它是中国当代文学比较重要的环节之一。“文学报刊在进入‘当代’之后,在性质上,作品的刊发方式上,和作家、读者关系上,这些方面有什么特点,发生什么样的演化,又怎样制约、影响当代文学的性质”,这些问题虽然已经受到研究界重视,但从目前的情形看,还很难说已取得实质性的重要成果。^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学术观念和现实政治—学术体制的限制,以及材料获取的困难。^②随着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强化,以及一些历史文献的解密,相关研究必将向纵深挺进,但这显然需要一个过程。

其次,传媒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张力,研究者必须强化对象意识、问题意识,更多地从文献、史料出发,落实到文学生产的层面,牢牢地把握研究对象。只有将问题还原为历史过程,将问题“语境化”,理论阐释才能真正具备有效性,才能提出真正有意义的命题,挣脱现有的学科体制及其范式的束缚。问题意识是研究主体的一种“假设”、一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第193页。

② 洪子诚:《历史承担的意义》,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364页。